

寻找新的符号模式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困境引起了来自多方的关注，其中符号学家也对语言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提出置疑。他们认为，索绪尔颠倒了符号与其所在系统的关系，故而把符号看成由结构分解而成。与此相反，另一位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则把人的生活经验看成符号意义的来源。也就是说，符号在进入系统之前就已经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所以结构关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语言学研究的惟一内容。

来自符号学领域的批评

1978年6月28日至30日，来自15个国家、代表85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约200名学者汇集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专门讨论语言学与符号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互补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来自符号学领域的代表都对当时的语言学研究现状表示不满，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是美国语言学家兰德爾(Joseph Ransdell)。他在题为“符号学与语言学”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用符号学语言学(Semiotic linguistics)来改进传统语言学。他说：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里，我们要讨论符号学方法与“封闭式”语言学之间的对比。封闭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术语，我用它来代表通常被称为“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乔姆斯基语言学以及其他一些学派所共有的那种关于学科思考的方式。我的论点是，按照那种思路建立起来的语言学不可能是真正的经验科学。¹⁰

熟悉近代语言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此之前人们对现代语言学的评价普遍很高。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曾这样说：“语言学，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任务之确切性而言，都是在人文科学中最先进而且对其他各种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语言学家彼德森(Holgar Pedersen)也宣称：“古代世界给欧洲留下的遗产是很沉重的，里面充满着对于语言历史的误解。新时代的语言科学在这份遗产的重负下辛勤劳动，直到关于语言的知识摆脱了古人的梦境。”¹¹然而在兰德爾看来，对现代语言学的类似赞美之词有些言过其实。

兰德爾选择当代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ohn Lyons)为现代语言学所概括的以下五大特点为出发点：

- 1) 承认口头语言的优先地位；
- 2) 采用非规范性的描述方法；
- 3) 承认共时研究的优先地位；
- 4) 承认“语言”与“言语”的区分；
- 5) 接受结构主义的观点，把语言看成一个关系的系统，而系统成员(声音、词语等)没有独立

¹⁰饶赫(Irmengard Rauch)等编：《指称动物：语言与经验的规则》，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0年版，第136-137页。

¹¹转引自陈明远：《语言学 and 现代科学》，第3页和第21页。

于等同或对立关系的意义。¹²

在兰德尔看来，所谓的“现代”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差别大多是表面的。他对上述这些特点一一进行了反驳：¹³

倘若第一个特点指的是将口头语言所特有的非语言因素结合进语言学研究，那倒意味着一个相当重要的方法论的转变，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口语的关注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只是产生了复杂深奥的音位学。虽然音位学本身有它的重要性，但它不过是传统语言学的延伸，并不构成新的学科基础；

第二个特点其实毫无意义。规范本来就是描述的效应，况且人为的规范作用对促进人际交流和语言习得方面也有其相对的社会合法性，而现在的语言学家们很少看到这一点。此外，语言描述总要以某个社会群体的言语习惯为参照。即使语言学家一再声明不对语言用法的优劣作任何评价，但他们的表态并不重要，因为语言学著作的实际效应如何，主要取决于读者对语言描述的反应，而不是作者本人的意图或态度；

第三个特点的提法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凡接受“共时”和“历时”之区分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历时描述”实际隐含着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时代的语言状况的描述。所谓的“现代”语言学不过明确地提出了这一区分，但这绝对不是什么新的观念；

莱昂斯对第四个特点的描述显得轻描淡写，也许是顾忌持不同观点的当代语言学家反对，他并没有强调“语言”较之于“言语”的优先地位。然而，将语言系统(结构)及其具体表现区分开来是否现代语言学的独创，还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此外，研究抽象的语言结构，则必须从具体的言语存在着手。即便是乔姆斯基为展示语言深层结构而创造的类似“Flying/planes/are/dangerous.”的句子，也还是一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在象牙塔里说出的具体言语。可见语言和言语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不存在，或者说不应该谈孰先孰后的问题；

只有第五个特点是过去的语言研究中所缺少的。所谓“关系”，显然是指索绪尔的横组合和纵聚合这两个概念。虽然传统语言学里也有相应的范畴，如词性分类和句法结构，但现代语言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坚持语言成分没有独立于相互关系的意义。德国思想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将索绪尔比作人文领域里的哥白尼，正是因为后者提出了系统关系决定一切的大胆主张。卡勒教授这样写道：

对卡西尔来说，现代语言学的关键和革命性在于索绪尔坚持关系和关系系统的重要性。……这一策略可以被清楚地表述为研究重点由实体转向相互关系。相互关系创造和

¹² 莱昂斯：《现代语言学导论》，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50 页。

¹³ 饶赫(Irmengard Rauch)等编：《指称动物：语言与经验的规则》，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5 页。

规定了实体，反之则不然。¹⁴

我们可以将现代语言学的这一特征追本溯源到索绪尔那里。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强调，语言符号是整体结构的一部分，“语言中只有差别。此外，差别一般要有积极的要素才能在这些要素间建立，但在语言里却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¹⁵换句话说，索绪尔认为语言结构的消极区分是符号意义的来源。既然这一命题的意义如此重大，我们不妨在此重新考察一下这对因果关系，看其是否成立。

谈及意义的产生，索绪尔实际加入了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进行的关于语言与思想之关系的讨论。在他看来，听觉形象与概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不可分割。他打了一个比方，把语言符号看做一张纸片：“思想是其正面，声音是其反面。我们不可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1页。假如索绪尔仅仅想说明语言与思维的密切关系，这也不能算什么新的发现。传统语言学理论对此早有阐述，认为思想和语言总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转换的。说得更通俗一些，符号的声音和思想是存在于同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不同的对立面，声音是它的形式部分，思想则是它的内容部分。这两个要素相互依赖，互为条件：没有声音，思想就得不到体现和传递；没有思想，声音只是纯粹的物理现象。

传统语言学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证明语言与思维相互依赖的事实。首先，高度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使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跟我们人类一样，许多其他动物类也具备发音的生理机制，并且能够发出多种清晰的叫声。当代人类学家的大量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像黑猩猩这样的人类近亲也能够发出三十多种可以相互区别的声音，但除人类以外，没有任何动物类可以说具有语言(这里指能够脱离产生它的直接环境的符号系统)。其他动物类之所以没有语言，是因为它们不具备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而真正含义上的语言必须是声音和思想的结合。人类语言是高度抽象思维的媒介，因而可以说是形、意结合的产物。在由猿演变成人这段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一定也曾经经历过那种能够叫出几十种物理声音，但仍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语言阶段。只有在他们获得了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以后，人类的语言才得以发生和发展。

同样，抽象思维的凝固也有赖于语言的物质形式。虽然思想不是从物理声音中直接产生的，但语言的物质形式却是体现和传递思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的思想必须依靠发音器官被传递，依靠听觉器官被接受。没有这些外部形式，我们的内部心理经验就无法表达出来。所以说，思想和声音是相辅相成的。

应该承认，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思想之关系的论述与传统语言哲学不尽相同。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把理念看成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实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其中包括语言符号)只是那些永恒理念的影子。这一观点后来被唯物主义哲学所颠倒。在被颠倒的理论中，先于语言而存在的不再是理念，而是事物内部的客观本质。事物的本质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然后通过语言符号得到实现和传递。但无论在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哲学中，语言符号都被看成是负载某种非语言内容的形式。按照这样的解释，语言就变成一个后置于本身井然有序

¹⁴ 卡勒：《费迪南·德·索绪尔》，第126页。

¹⁵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8页。

的客观世界之上的次级结构(a/secondary/formation)，或者说，它成了附加在客观世界现成秩序之上的一组工具。索绪尔要反对的正是这种将语言看成是思想之外表的观点。他指出：

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同飘浮不定的思想王国相比，声音本身是否呈现为预先划定的实体呢？也不是。声音实质并不更为固定，更为坚实；它不是一个模型，思想非配合它的形式不可，而是一种可塑的物质，本身又可以分成不同的部分，为思想提供所需要的能指。¹⁶

索绪尔在这里实际想强调的是，语言和思想不仅相互依赖，它们还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不可分割。在语言产生之前，思想“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于语言材料而存在的纯粹概念，无论它们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唯物论的事物本质。在声音层次上亦是如此，语言在建构概念的时候也同时为它们界定了相应的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语言体现或者传递了现成的思想，而是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同时产生。

索绪尔这段论述非常接近德国思想家卡西尔的观点。在论及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时卡西尔曾说：“精神意识与感觉意识是在基本的符号功能及其各个方面第一次被真正区分开来的。就是在这里，我们超越了对不确定的外部材料的消极接受，并开始在它身上留下我们独立的标记，这些标记进而将它分割成各不相同的现实领域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神话和艺术、语言和社会构造了存在；它们不是原有现实的拷贝。”¹⁷我们知道，卡西尔是他同胞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的追随者，他强调语言不是负载现成概念的被动工具，而是积极整理思想这一浑然之物的“建构性工具”(a/formative/organ)。跟卡西尔一样，索绪尔也认为语言的功用不是再现已经存在并独立于语言的本质或者意义，相反，是语言构造了世界，并使之可以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明确起来。因此，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而是指的这一颇为神秘的事实，即‘思想\声音’就隐含着区分，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¹⁸

卡西尔和索绪尔都认为语言不是现有概念的简单复印，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们在概念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却分歧很大。对卡西尔来说，概念是由某种普遍意识(a/universal/consciousness)在语言的帮助下构成的。虽说在语言产生之前不存在任何现成的概念或思想，但仍然有一个思维主体面对着浑然的、非语言的生活经历，即他所谓的

¹⁶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10 页。

¹⁷ 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卷 1，语言》，耶鲁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7 页。

¹⁸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10-111 页。

“不确定的外部材料” (indeterminate/outward/material)。因为意识所追求的是普遍性，它不需要特殊生活经历的全部信息，所以就诉诸声音系列，将经验之流当中的重要片段和方面凝固起来，以备后用，其结果就是语言中的概念和思想。这些概念并不属于某一具体的情境，而是被用来概括相互类似的一组情境。索绪尔对概念形成的理解却与此大相径庭。在卡西尔的理论中，语言是外部世界与思维主体之间的中介，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这一相互关系：

主体〈—〉语言〈—〉世界

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思维的论述切断了语言两头的联系，从而使语言变成单独存在的符号系统。下面是他对概念形成的描述：

我们可以把全部语言事实，即语言，设想为一系列相连接的小区分，同时画在模模糊糊的观念的无限平面 (A) 和声音的同样不确定的平面 (B) 上面，大致如下图 (图 9) 所示：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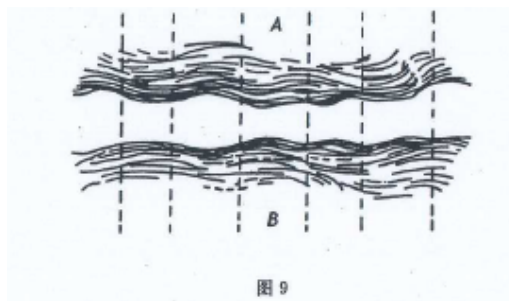


图 9 向我们表明在语言产生之前不可能有现成的概念和声音单位，但它同时也暴露了索绪尔的整体论语言观 (holistic/view/of/language)。索绪尔认为，孤立地考虑某一具体的声音系列与概念的结合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各项要素着手，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可以构成系统，实则与此相反，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出于上述考虑，索绪尔撇开了通过意义将我们与世界相连的具体词语，把两个先验存在的声音和概念连续体作为他解释概念之形成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两个连续体的结合产生了概念。这样一来，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就成了某种自我运动的精神 (an/autoeffective/spirit)，它能够自行解体而产生多个组成部分。索绪尔进而指出，不同的语言自我解体的方式不一，因而对同一片“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作出不同的分割。相同的概念区域在一种语言里可能是一个单位，但在另一种语言里可能是两个或几个单位。例如，法语里的“mouton” (羊) 同时与英语里的“sheep” (羊) 和“mutton” (羊肉) 相对应，但英语词“sheep”的意义却不同于法语词“mouton”的意义，其原因是法语“mouton”一词所覆盖的概念范围在英语里被两个词占据。法语“mouton”与英语

¹⁹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10 页。

“sheep”两个词义之间的差别取决于它们在各自语言系统中的位置。索绪尔由此得出结论，词语的内容由同一系统内其他成分的共同存在来决定。识别某一个概念，就是将它同其他的概念区别开来。概念的自我肯定来源于它对系统内所有其他概念的否定。

这一观点后来在叶尔姆斯莱夫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叶尔姆斯莱夫使用的术语与他的前辈稍有不同，但他基本上还是承袭了索绪尔的语言整体论，并通过他本人广泛的学术活动对此后的语言学理论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影响。他说：

自索绪尔以来，语言内部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经常被提出，语言不可能只有这些成分而没有那些成分。尽管这一观点有时被夸张和误用，但它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所有的事实都表明，索绪尔处处寻找“关系”，并且认为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他认识到语言中的相互关系是头等重要的。²⁰

叶尔姆斯莱夫与索绪尔一样，把语言定义为“由各种内部关系组成的独立实体”(an autonomous entity of inner dependences)。虽然各种语言所面对的是相同的“思想团”(thoughtmass)，但它们却通过不同排列来强调外部现实的不同方面，因而划分出不同的界限。叶尔姆斯莱夫用下面这个广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援引的色段分布模式(图 10)来说明自己的理论：²¹



英语与威尔士语对颜色连续体的不同分割表明，任何表达颜色的词语意义都不是独立的概念，它不过是指称颜色的词义系统的一分子，它的身份必须由其他相关的成分来界定。我们只有先搞清楚这一颜色与其他颜色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把握它们的意义。所以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与某一非语言的实体相对应，而在于它跟同一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如何。

如果将这一结构主义命题推而广之，语言学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书”之所以是

²⁰ 叶尔姆斯莱夫：《语言理论导论》，第 23 页。

²¹ 同上，第 53 页。

“书”，因为它不是“猪”，不是“虎”，也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什么不是“猪”，不是“虎”，就必定是“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呢？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既不是“猪”，也不是“虎”，但它们却不一定是“书”。我们又怎样能够从许多不是“猪”和不是“虎”的成分中确定究竟什么是“书”呢？假如语言符号的意义真的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必须靠否定所有其他成分才能够得到确定，那么，语言又怎么可能是人类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呢？索绪尔的否定区分原则显然站不住脚。

我国已故语言理论家高名凯曾一针见血地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困境归咎于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先于语言成分而存在的假设。他说：

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的学说和他的语言系统的学说显然带有许多错误的观点。系统先存在于个别的组成成员，这就是唯心主义的绝对论在语言学中的反映，好像语言不是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创造出来的，而是早就存在的一个系统，个别的组成成员只是由于被放在这个系统里而有它的存在。这种预先存在的系统是不可想像的。²²

高先生这里的诊断还牵涉到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另一对重要范畴，即语言 (langue) 和言语 (parole)。按照索绪尔的解释，语言是一组形式，或者说，是为同一社团的全体成员所共有、个别成员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逐步消化的语言规则；而言语是人们对语言的实际应用，讲话者从语言系统中选择自己需要的成分，并将它们组合起来，从而使这些成分得到具体的表现。他还认为，对言语特征的描述是不重要的，因为区分语言和言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对象必须“本身是一个整体”(whole/in/itself)，并且受“分类原则”的统摄。一旦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我们就区分了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偶然的。

当今绝大多数语言学家并不反对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但索绪尔将语言看做先于言语而存在，将言语看做语言的体现的观点却是不可接受的。传统的语言研究向来在个别的词语中寻找符号的意义，这些词语既和使用语言的主体有联系，又同现实世界中具体的情境相关联。索绪尔语言学抛弃个别符号这一有效的研究起点，从而割断了符号意义与外部世界事物的联系。而且，语言在个别成分的层次上跟外部世界之联系的失落并没有在整体结构和系统的层次上得到补偿，因为在索绪尔的体系里，起始结构被看成是两个没有定形的浑然之物，它们当然就不可能同语言之外的物体和事件的具体特征发生联系。这样一来，索绪尔对概念形成的描述就彻底忽视了语言与世界的联系。人们为表达某种意义而选择特定词语的行为也在他的理论中失去了重要性，因为无论我们选择什么语言形式，在此之前都已有一个结构或系统需要我们去解释。真可谓盘古开天，结构已存。

那么语言系统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看做一个真正的实体呢？俄国符号学理论家瓦洛辛诺夫 (V. N. Volosinov) 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在详尽分析了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这两个理论流派之后，他得出结论：语言的共时系统并不与语言历史中任何真正的时刻相对应，它只是人们为了衡量语言所发生的变化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尺码。没有这样的社会性建构，语言仅仅是一种活动，它在不断生成新的形式。他说：

²² 高名凯：《语言论》，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36 页。

从真正客观的角度看，即完全忽略语言在特定历史时刻对特定个人所呈现的状况，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在不断流变和发展的图画。如果从上面客观地观察语言，历史中并没有可以建立共时语言系统的真正时刻。²³

瓦洛辛诺夫这段话的意思是，本体意义上的语言系统并不存在。例如，莎士比亚创作他的剧本的时候，英语语言跟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交际过程，我们可以假设在莎翁写作的时刻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早期现代英语共时系统，但它只是我们为比较莎士比亚时期的英语语言和其他历史时期英语语言之间的异同而主观构造的。换句话说，语言系统是语言学研究的产物，而不是由母语使用者本人的意识所引起的。在具体使用语言的时候，讲话者的主观意识并不把语言当做一个符号系统。如一个讲汉语的人在实际会话中使用“桌子”这个词语的时候，该词语并不是以语言系统中的某一成分出现在话语情境中的，说话者只知道自己和他所认识的其他人曾经在类似的真实生活情境中使用过这一词语。

语言符号的意义与外部事物和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象形文字中尤为明显。例如汉语中“象”这个词，它一般指称耳朵大、鼻子长、有一对长大门牙伸出口外的动物。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概念的形成与语言之外的物体没有关系，该词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它不是“虎”，不是“鹿”，也不是“马”等等；这一解释显然与汉字的发生情形不相符合。请看下图（图 11）：

²³ 瓦洛辛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6 页。

Modern Form	Gradual Evolution	Earliest Form	Meaning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elephant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tiger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deer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horse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ox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sheep
狗	狗 狗 狗 狗 狗 狗 狗		dog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fish
蛙	蛙 蛙 蛙 蛙 蛙 蛙 蛙		toad
龜	龜 龜 龜 龜 龜 龜 龜		tortoise
蛇	蛇 蛇 蛇 蛇 蛇 蛇 蛇		snake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bird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雀		sparrow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swallow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WRITING FROM ANCIENT TO MODERN FORM

图 11

上面这些汉字的演变历史向我们表明，“象”的词义并非产生于系统结构的分割，而是来源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物体的认识和把握。

事实上，任何人在解释意指现象的时候都不可能不参照语言外部的物，索绪尔自己也不例外。无论他怎样刻意排除非语言实体的相关性，语言外部的物体和事件还是很顽固地钻进了他的理论阐述中。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本维尼斯特 (Emile Benveniste) 曾有如下评论：

很清楚，他无意识地、悄悄地使用了被自己早先的定义排除在外的第三个因素，这一事实证明了他的论点是错误的。这第三个因素即物自身，也就是现实。尽管索绪尔声称“姐妹”的概念与能指 s-o-r 没有关系，但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说而不在考虑这一概念的现实。在提及 b-o-f 与 o-k-s 之间的差别时，他无意识地依赖于一个事实，即这两个成分指称同一个现实。在这里，早先被符号的定义直截了当地排除在外的物体又悄悄地绕路爬了进来，并在那里永久性地置放了一个矛盾。²⁴

本维尼斯特这里所暗示的理论矛盾是，索绪尔一方面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

²⁴ 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中的问题》，迈阿密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44 页。

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说同一个概念可以在其他语言中跟不同的声音系列相结合。那么这个既可以与这一声音系列结合，又可以与那一声音系列结合的概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索绪尔本人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矛盾，但如果我们同意本·维尼斯特的分析，并承认汉字意义的来源是外部世界的物体，我们就不应该怀疑语言符号的意义是否与外部世界的事物或状态相对应。相反，我们应该问外部世界是如何在语言中被概念化了的。

既然语言系统只是“需要我们作出巨大努力并且有意识地认识和实践才能够达到的一种抽象”，瓦洛辛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我们就应该从人的生存环境来考察语言符号的意义来源。首先，存在于语言之前的不是索绪尔的思想和声音连续体，而是人类生活经验的万花筒。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人类被迫就周围的物体以及发生的事件作出假设以预测未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曾说，人永远不可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人类的生活经历同样如此，它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独特而不可重复的。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处境，人类不得不努力在奔腾不息的生活急流中抽提出一些过去似曾出现的片段。一旦无限的生活经历被切割成容易驾驭的小块，人类就开始在这些“事件”或“物体”中寻找差别或相似之处。如果不能依靠这些差别和相似之处将自己的经验归类，人类将永远是此时此地的独特性的奴隶。乙事件紧接着甲事件发生，假如仅此一次，以后不再发生，我们即使知道其中的原因也没有意义。如果多少有点相似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发生，那么对这些事件进行抽象就成了我们预测未来的基础。

根据相似和差别将事物分类的本领当然并非人类专有，其他动物类也通过本能来进行同样的工作。例如在很多情况下，当养有爱犬的家庭里某个成员拿起牵狗的皮带时，那条狗一定非常激动，因为它过去的经历告诉它甲事件（主人伸手拿皮带）很可能导致乙事件（主人带它去散步）。马戏团或动物园里的动物表演也是如此，动物都根据驯兽员的奖励和惩罚来归类自己的行为。这不等于说人类跟其他动物类完全一样，因为在人类对环境所作的分类中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他们不仅用现成的物体标记自己所作出的分类，而且还创造了各种人工符号，从而使他们的分类工作更加有效、便利和经济。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大大超越了其他动物类，他们能够通过绘图作画、排列数字、建构公式等手段在不停的时间之流中记载相对重复性的生活片段。所以卡西尔这样说：

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实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²⁵

卡西尔所说的符号系统泛指神话、宗教、艺术、音乐、语言等各种人类文化之创造，其中语言文字的发明最为重要。通过几十种声音的不同组合，人类能够对无穷多的生活经验作出分类，这是任何其他动物种类所不能比拟的。一旦生活经验的某个片段在声音系列里得到记载，它就可以通过那一词语（音、义结合即构成语言符号）被人类再现和唤起。事实上，词语每天都给我们带来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过去的人物、他们的活动以及当时环境中的颜色、声音等等都会通过词语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可见语言的确是再现外部世界的一种主要

²⁵ 卡西尔：《人论》，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2-43页。

手段。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事件一经发生，便很快消失，但它们在语言中的再现却得到长期的保持。人类就是通过再现来帮助自己更好地认识和适应周围环境的。

专门从事儿童智力发展研究的俄国心理学家维格斯基(Lev/Vygotsky)也从语言习得的角度就概念或意义的形成得出了与结构主义截然不同的结论。他指出，理论界之所以在概念形成的问题上没有产生重大的成果，是因为：

首先，它只研究概念形成过程的最终成品，忽视了这一过程本身的动力和发展。……其次，这种将注意力集中在词语上的方法没有能考虑生成概念的知觉和大脑对感觉材料的处理。感觉材料和词语都是概念形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孤立地研究词语就将整个过程限制在词语的层次上，这违背了儿童思维的特点。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得不到探索；……²⁶

维格斯基的批评击中了索绪尔关于结构区分生成概念这一思想的要害。在前者看来，概念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而语言的概念只是它的成品。人的认知过程的初级阶段是非语言的，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儿童能够为周围的事物归类，成年人能够无声地使用工具，这些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索绪尔对概念形成的初级和高级阶段不加区分，自然就不能够正确地解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明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维格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进行过一组实验。在其中一项实验中，实验员将 22 块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高度和不同尺寸的木块放在实验对象的面前。这些木块有 5 种颜色，6 个形状。实验的目的是希望实验对象按照尺寸(大与小)以及高度(高与平)对木块分类。实验员分别为这四种组合指定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名称：又高又大的木块被称为“lag”，又平又大的木块被称为“bik”，高而小的木块被称为“mur”，平而小的木块被称为“cev”。在每个木块的底面注有该木块所属的类别名称，但实验对象看不见。然后，实验员向实验对象显示一个木块的名称，并请他挑选出所有属于同一类别的木块。如果他猜错了，还可以再试。每重新试一次，就有一个错放的木块被颠倒过来让他看一下底上的名称。随着越来越多的木块被翻过来，试验对象逐渐开始理解这些本来无意义的名称指称的是木块的哪些特征。当他完成了上述的分类，“语言中尚无对应名称的新概念就得以建立”。维格斯基：《思维与语言》，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3-104 页。试验员接着又去证明凝固在语言中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对周围的事物进行分类，这一点已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在此不加叙述。以上的实验足以表明，我们的知觉机制在概念的形成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组织和安排开始于日常的实际活动，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事物特征的感觉将它们分类的。这些实际活动又把我们引向概念形成的下一个阶段，即语言的思想。

我们从前几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在批评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时候，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都以颜色词语在不同语言中的语义场相互不等这一例子作为理论阐述的杠杆。无独有偶，当代语义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同样证明，语言符号的意义或概念与指称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语言学家艾伦在其《语言的意义》一书中为我们总结了有关颜色指称的最新研究成果。艾伦：《语言的意义》，鲁特利奇出版公司 1986 年版，

²⁶ 维格斯基：《思维与语言》，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6-97 页。

我们从前几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在批评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时候，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都以颜色词语在不同语言中的语义场相互不等这一例子作为理论阐述的杠杆。无独有偶，当代语义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同样证明，语言符号的意义或概念与指称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语言学家艾伦在其《语言的意义》一书中为我们总结了有关颜色指称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一篇题为《基本颜色词语：它们的普遍性及其演变》的论文中，柏林和凯根据颜色词语在 20 种不同语言中的演变，首次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颜色词语排列如下：

第一阶段：在所有的语言里都有指称黑色和白色的词语。

第二阶段：语言中如果有第三个指称颜色的词语，它一定是指称红色。

第三阶段：语言中如果有第四个词语指称颜色，该词语不是指称黄色，就是指称绿色(但指称这两种颜色的词语不会同时出现)。

第四阶段：语言中如果有五个指称颜色词语，其中就既包括黄色，又包括绿色。

第五阶段：语言中第六个颜色词语指称的一定是蓝色。

第六阶段：语言中增加的第七个颜色词语一定指称棕色。

第七阶段：如果一个语言有八个或八个以上指称颜色的词语，其中也许就有紫色，或粉红色，或灰色，或这些颜色的组合。

随后，这两位研究者又请了许多讲不同母语的人分别辨认各自语言中每一种颜色的色段界定。他们得出的结果是，“所有语言中的基本颜色词语的色段界定大致相同。”凯后来还与另一位名叫麦丹尼尔(MaDaniel)的学者合写了一篇题为《基本颜色词义的语言学意义》的文章。那篇论文所报告的情况也证明了同一事实：即对应于那些基本颜色的色调与光波的长度有关，而这些波长又与英语使用者选择作为同一颜色的色段的波长相等。凯和麦丹尼尔由此得出结论，所有语言中表达基本颜色的词义直接反映了人类神经反应的普遍范畴的存在。

上述研究成果还表明，颜色分辨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同样有赖于我们的感觉经验和知觉经验。罗斯卡斯(Eleanor/Roschas)在《论知觉与语义范畴的内部结构》一文中指出，虽然任何社团最先总是把颜色分成非常笼统的复合体，然后再逐渐区分几个主要的颜色，但处在语言第一阶段的人能够很快地学会区分次要的颜色。他们在此之前之所以没有造出指称那些基本颜色的词语，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从知觉上区分这些颜色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必要用语言去表达这些知觉上的差别。颜色词语的产生和演变依赖于某一社会或团体对于进一步区分颜色的需要。这种需要一旦出现，对颜色的更加细致的区分也就随之而来。但无论颜色词语何时产生，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由语言系统的自我分割而产生的。相反，它们的意义来自我们对指称对象的知觉特征的抽象和总结。这一语言学成果对我们批判结构主义理论尤其重要，因为结构主义者最常利用颜色词语与其指称对象之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来否定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

生物的世界最初是无语言的，索绪尔在这一点上没有出错，然而语言一旦形成，它也成了人类生存环境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为人类每天、每时、每刻都要碰到大量的信息，所以能否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处理这些意义单位对我们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记载本身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结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便捷地从中寻找所需要的生活片段。本书在前面提到，索绪尔将语言的结构分成两大类：即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按照他的解释，在纵聚合段里，语言成分的价值通过否定其他成分才得以确定；而“在

横组合段里，一个成分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成分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23页。与他关于语言与言语的论述一样，索绪尔对符号与符号的结构关系的解释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传统语法中，类似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的讨论比比皆是，但人们并没有得出像索绪尔那样的结论。请看下面这个句子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

The research project was finished with the help from his colleagues.

在单词和词组的层次上，相互之间存在横组合关系的成分有：“the research project”，“was finished”，“the research project was finished”，“the help from his colleagues”以及“with the help from his colleagues”。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成分在语法上相结合，其中一项成分修饰另一项，这样的结合构成横组合关系。然而，这些横组合关系只能说明语言成分的安排是有结构的，仅此而已，但它们并不能证明语言成分的意义由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相反，上面这些成分在进入横组合关系之前就已经具有固定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还会因为意义相近或者相反而跟其他成分结合成不同的纵聚合关系，如同义词聚合关系和反义词聚合关系，等等。可见，我们可以完全承认语言的结构特征，但并不需要，也没有理由否认人类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是符号意义的来源。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对讲英语的人来说，“Chow Mein”（炒面）是一个新词，它指称一种中国式的油炒面条。该词之所以获得现有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不是意大利式细面条或者其他任何面条。相反，“Chow Mein”的词义来自人们对中国餐馆和西方家庭中常见的一种食物的抽象：一种把面条、肉丁或鸡丁以及若干种蔬菜一起放在油里小炒而成的食物。我们可以断定，总有那么一个讲英语的人首先碰见这种食物，因为在他的母语中没有合适的词，他就借用了“Chow Mein”这个广东方言中的词语来指称这一生活经验中的新实体。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该词就渐渐成了英语语言的一部分。作为语言中的一个成员，它既可以与其他成分结成横组合关系：（I ate some Chow Mein yesterday --我昨天吃了一些炒面），也可以作为名词、外来词或者一种面条与类似的语言成分构成多种纵聚合关系。这个例子再一次表明，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会消除词义与指称事物之间的对应而成为索绪尔所描述的那种不具内容的空洞形式或结构。

其实，就连索绪尔自己提出的纵聚合和横组合关系本身也是语言学家对语言成分实际运用规律的抽象。根据它们在实际话语中的具体功能，词语的结合方式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主谓关系、动宾关系、形容词短语和副词短语。按照乔姆斯基的解释，在主谓关系里，主词的内容即谓词内容的功能；动宾结构表达的是因果逻辑关系；第三类横组合段（形容词和副词短语）体现的是成分与成分之间的修饰关系。因为词语在句子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随着语言的发展，它们便逐渐获得一定的形式特征。我们通常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将它们归类：

education	typify	logical
relation	justify	focal
donation	solidify	global

不是所有词语都带有明确类别标记的。英语中“contact”一词就是一例，它既可以作名词，又可以作动词，但却没有词形上的变化。然而，重要的不是词形变化，而是词性本身。

我们通过不同词性对生活经验的不同方面进行归类，如用名词表示事物，用动词表示行为和动作，用形容词和副词表示事物的特征和状态。

为语言符号的语义特点归类远比为它们的形式归类来得复杂，这也是结构主义理论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请看乔姆斯基下面这个著名例句：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无色的绿色思想愤怒地睡觉。)

从其横组合关系上讲，这个句子里有好几个完全合乎规则的组合，“思想睡觉”为“主+谓”结构；“无色的绿色思想”为“形容词+名词”结构；“愤怒地睡觉”为“副词+动词”结构。从纵聚合关系上讲，“思想”作为抽象名词可以跟许多其他抽象名词组成系列，其余的成分也可以因其是动词或者副词而跟别的成分结成纵聚合关系。但是，就这样把语言成分按照语法规则组合起来，上面这个句子还是不能传递明确的意义。这表明，除了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语言中的成分自身还载有一定的意义，而理解这些意义则有赖于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也就是说，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重性实体，它一方面具有结构特征，与其他成分发生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或多或少地与人类生活经验的片段或单元相对应。